



# 拗相公”王安石的悲剧

□ 风临

从仁宗时代的“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”，到徽、钦二帝的“靖康耻，犹未雪”，北宋王朝由盛而亡，仅用了短短100年时间。而这份亡国的罪状书，很久以来，都由王安石一个人背负了。

直到近代，对王安石的评价才有了180度的转变。梁启超说他是“三代下唯一完人”，列宁称“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”。

他和他的改革，真相到底如何？

## 最好的士大夫

王安石首先是个文人，一篇文章和道德都无可挑剔的文人。

1041年，宋仁宗庆历元

年，

20岁的王安石给父亲守满了三年孝，从江宁出发，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开封。当时的文化名流曾巩、欧阳修，一看他的文稿，惊为天人。第二年，科

举应试之日，王安石的锦绣文章，被主考官一眼就相中为状元卷子。

卷子送到仁宗那里后，发生了意外。

一句“孺子其朋”，让仁宗皱起了眉头。这是周公训成王的话，“你这年幼的王啊，今后要和群臣融洽相处”。区区一个王安石，竟敢用这种口气对答天子考题！再读下去，觉得文笔冷峻峭拔，很不对胃口，便降到第四名。

第四名就第四名吧。关键时候，人品立显。王安石没有酸溜溜地说状元本来是我的，也没有矫情地说我才疏学浅，总之，他严肃而平静地接受了平生第一个官职：淮南签判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他在地方

上一干就是25年。他喜欢《周礼》，卷不离手，但他看的不是文学，而是政策，那些上古的朴素政策，有哪些可用于眼下的政务。

到鄞县当知县时，王安石走遍了14个乡，兴修水利、兴建县学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开始尝试把官粮低息借贷给农民，秋收以后再还给官府——这是日后“青苗法”的第一次实地预演。正是试点的成功，让王安石坚信以《周礼》为蓝图的改革是可行的。

于是，王安石给仁宗写了一封万言书，情真意切，告诉皇帝他对国家命运的种种思考。御书房内，人到中年的仁宗，翻开了这卷沉甸甸的奏折，久违的“王安石风格”扑面

而来，冷峻如昨，犀利如昨。

然而此时的仁宗，正因后宫无子，整日被包拯、韩琦等一干老臣催问继承人的问题，恨不得撞墙才好。万言书来得实在不是时候。

他冷冷地将奏章放回原处。

得不到回应的王安石，心里也很清楚，变法时机还没到。他继续埋头自己的改革试验田。朝中不少大臣如欧阳修、韩琦，都非常赏识他，几番邀他人京，却被他回绝。

钦差把人京的圣旨带到了王安石家门口，他竟然极富想象力地躲进了茅房。钦差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，他抓起圣旨一路狂奔还给了钦差。

在北宋这样一个崇尚文士精神的社会里，王安石无疑成了士大夫的领袖、精神的贵族。

## 最超前的改革家

直到1067年，年方20岁的神宗继位。

20岁，对于现代人来说，还是上网聊天、结伴出游的青春岁月，但是在940年前，这个毛头小伙子，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夹击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的“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”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画的市井繁华，都是脆弱的表象。国库没有一分钱，一年挣多少就花多少。那么多官僚、那么多军队、那么多佛寺道观，一张张嘴都在等着钱；辽、西夏、金，攻城掠地，无一日安宁，开战也好，求和也好，都需要钱。

20岁的神宗感到了巨大的压力。他想创造一个比仁宗更好的时代，他想向世人证明自己也能收复山河、堪比汉武帝。他还是太子时，就对王安石的《万言书》推崇备至，现在，他迫不及待地召王安石回京。

那一夜，仿佛是周文王找到了姜子牙，刘备遇见了诸葛亮。神宗急切地问：天下怎样才能大治？王安石答道：先要选对施政的策略。

他又问：唐太宗的政策怎么样？王安石肃然正色：陛下应该效法尧舜，何必学唐太宗。

1069年成了王安石一个人的舞台，他像一颗慧星，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。他官拜参政知事（宰相职），颁行均输法、青苗法、农田水利法、保甲法、市易法、保马法、方田均税法……权倾朝野，政界为之变色。5个宰相里，除了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，其他6人都活跃在仁宗时期，以至于林语堂说，这是中国文人“最好的时代”。

很多年以后，激进的王安石改革失败了，宋神宗又恢复了祖父仁宗的温和改良做法，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：“不许再去边界惹事，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。”辽国人或许不会懂得，他们敬畏的这个宋朝皇帝，为什么叫“仁宗”。仁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；在中国历史上，他是第一个被尊称为“仁宗”的皇帝，并造就了北宋一世的繁华。

（据《环球人物》）

廷要进行中央采购；甚至唯一得到众人赞同的募役法，就是劳役的货币化经营……你不得不惊叹，王安石的思想、政策，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几百年，甚至1000年。

超前，注定了王安石是孤独的，宣告了他的改革将惨烈地失败。

## 最“拗”的人

变法把北宋王朝拖入“党争”的漩涡，朝廷空前分裂。

一边是“熙宁新党”，但除了王安石，没有一个正直的人，可以说，宋神宗和王安石带着一群来路不明的人在办事。另一边是“保守旧党”，非但有司马光、苏轼这样的社会精英，还有韩琦、文彦博这批范仲淹改革的旧臣。

不仅仅是他们的目光不及王安石深远，更大的悲剧源于改革者自身的性格。北宋谁人不知，王安石浑名“拗相公”？

他不梳洗就出门会客，看书时随手抓到什么吃什么。有一次仁宗设宴，王安石面不改色地吃掉了茶几上一盘鱼食。难得请客的包拯招待同事，不胜酒力的司马光都喝了几杯，王安石却死活不举杯。

变法开始后，王安石性格里的“拗”，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，让他看不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。

比方说青苗法。青黄不接的春季，官府低息贷粮给农民，秋收后农民再按息还粮。王安石夸下海口说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”，两全其美。但结果呢？一个农民敲开了县衙大门，官吏说借粮可以，先填申请表吧。农民是个文盲，花钱请了书吏，填了表，石沉大海。一咬牙，掏钱给官吏好处费。到了还贷时，一算利息，好家伙，竟是原定两分利的35倍！王安石的改革成了一场黑色幽默。

老天也不作美。熙宁七年，大旱，民不聊生。宦官郑侠画了《流民图》献给神宗，哀哀哭泣：这是天怒人怨，只要您停止变法，十日之内必会下雨；如若没雨，我以人头抵欺君之罪。

这就是“宋朝第一忠谏”。神宗无奈，诏命：暂停青苗法、募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保甲法等八项新法。

三日之后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。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目瞪口呆，王安石站在皇宫外呆若木鸡。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。王安石知道，他再不会得到神宗的信赖了。

罢相、复职、再罢。终于，王安石回到了江宁。在听到最受好评的募役法也停止推行后，他拂衣悲喊：“亦罢至此乎？”抑郁而终。

执着和固执，一往无前和一意孤行，就像硬币的两面。然而恰是这一种“拗”，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王安石可爱又可悲的背影。他像一个闯入官场的墨小孩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但“政敌”司马光依然敬重他的赤子心。他“断送”了北宋王朝，但1000年后的史书读懂了他的天才。（据《人物》）

# 偶像皇帝宋仁宗

□ 佚名

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，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。

消息从皇宫传到街市，开封街头的一个小乞丐，起初一愣，接着竟放声大哭，踉踉跄跄就往皇宫跑。谁知宫门外早已挤满了人，褴褛的乞丐、斯文的书生、稚气的小孩……哭声一片，披着白麻，烧着纸钱，为皇帝“送别”。

消息从大宋传到辽国，彪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，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：“你说什么？他老人家怎么就过世了？”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
从贫民到敌人，都舍不得他死——皇帝做到了这个份上，大有“偶像巨星”之势。直到700年后，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，也不得不承认：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，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，就是宋仁宗了。

## 爹不疼娘不爱

宋仁宗出生时，那一声啼哭，让伸长了脖子的文武百官松了一口气——在他之前，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。于是他取名“受益”，5岁封庆国公，9岁为太子，13岁老爹一驾崩就改名赵祯，登基为帝。

比起后世的九子夺嫡，他的好命足以让历代皇子们嫉妒。

殊不知，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却过得异常艰难——他的糊涂老爹、那个签下了丢人的“澶渊之盟”的宋真宗，竟然时刻担心大臣们会利用太子架空自己，越看儿子，越有“被害幻想症”，干脆，先下手为强吧。

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：“陛下还有几个儿子，能让你想杀就杀？”这才让真宗正视了一个后果：杀了太子，就绝嗣了。

太子一条小命虽然保住了，可父亲的猜疑并没缓解。弥留之际，真宗满脑子都在想，这儿子不可信，只有把权力交给皇后。

经过父亲的“严防死守”，13岁的少年赵祯即位之后，也没过什么舒心的日子，最大的考验来自他的“母后”——章献太后。

看过《狸猫换太子》这出戏的人都知道，宋仁宗的生母是李妃，而章献太后正是戏中的坏人刘皇后。实际上，章献

太后非但不是“奸妃”，反而聪慧敏捷，颇有政治头脑，她理所当然地坐到了宋仁宗身后，垂帘听政11年。

权力的滋味一旦尝到就不想放弃，何况前朝就有一个武则天。章献太后把皇袍披到身上问大臣：“你们说，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呀？”

这个小动作让气氛变得紧张起来，太后和臣子们开始了权力拉锯。好笑的是，双方打出的旗号都是“保护天子”。年少的赵祯成了两派斗争的挡箭牌，也成了他们互掷的矛。皇位之上如履薄冰。

如果赵祯只是个昏庸的草包，那倒罢了，但他偏偏在孩童时，就能一眼洞穿父亲的宠臣王若钦“实是奸邪”。这样敏锐的孩子成了“夹心饼干”，会有怎样的内心煎熬？唯一能让后世浮想联翩的是，在这11年里，他酷爱书法，一手“飞白体”写得极为神妙。或许，练字就是练心。

也因此，赵祯成了一个异数——从吕后到慈禧，中国不乏母后掌权，在她们身边长大的小皇帝，要么敏感怯懦，要么偏激残暴。但赵祯却有了对弱者的同情、对世事的宽仁。正是这一点，决定了北宋初年改革的走势——高潮短暂，余音很长。

## 短命的范仲淹新政

公元1033年，宋仁宗亲政。

他太清楚接手的这个烂摊子了：老爹当年爱面子，为了弥补“澶渊之盟”受伤的自尊心，竟然一口气把“五岳”都封禅了。想当年，唐太宗想封禅一座华山，都因为太贵而作罢。可想而知，宋朝的国库消耗到了何等地步。

宋仁宗的第一把火就是抓经济。对外平息战争，对内作风俭朴，从而扭转了经济颓势，迎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。至此，他才腾出手来，寻觅合适的改革经纪人。

几经斟酌，呼声很高的范仲淹进入视野。1048年，宋仁宗宣布全新的“内阁名单”：调范仲淹回京，任参知政事（即宰相），与枢密副使富弼、韩琦一道主持朝政。

此时，范仲淹从政已28



年，改革在他脑子里酝酿已久，十大政策一挥而就——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覃恩信、重命令。宋仁宗当场拍板：准奏，全国执行。

但是，仅仅1年零4个月，范仲淹、富弼和韩琦相继被调出京城，改革突然刹车。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吗？不是。历朝历代，改革者如商鞅车裂、张居正掘坟，比比皆是，可范仲淹毫发无损，“圣眷”不可谓不深。是政敌暗算他吗？也不尽然。学几笔范仲淹亲信的字，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，这样拙劣的政治伎俩，宋仁宗不会看不出。

问题只在于，操之过急。

有一次，范仲淹审查一份官员名单，不称职的都毫不客气一笔勾销。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：“小范呀，你笔一勾，可害苦了一家人呀。”

范仲淹严肃地说：“不害一家人，就害了百姓了。”

富弼哑然了。不错，官员要严格选拔，可你只看一眼名单，又凭什么认定是庸官呢？范仲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他言简意赅地找到改革的目标，

却找不到复杂精细的实施办法。面对那封假造的退位信，宋仁宗看到了潜在的危机：群臣惶惶，范公孤立，新政还怎么执行？

## 文人最好的时代

范仲淹离去了，岳阳楼留下他的绝唱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但宋仁宗不会离去，开封城延续着他政治的部署——文彦博，一个有些保守的大贵族，接替了范仲淹的宰相职位。

这一次，宋仁宗选对了改革经纪人。此后十多年里，文彦博以沉默而实干的姿态，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图不动声色地贯彻了下去。和他一道的，是包拯、杜衍这批能臣。没有口号，没有激辩，范仲淹的十大政策，一条一条得以实施。

1050年前后，文彦博觉得宋仁宗在四川试点多年的纸币“交子”，向全国推广的时机成熟了。陕西长安的官员“立功”心切，说干脆废铁钱，只用纸币吧。此言一出，老百姓连忙抛售铁钱、抢购货物，长安经济陷于混乱。紧急关头，文彦博并没有强力推行“交子”，而是拿出自己家里的丝绸来到长安：“来来来，今日我卖丝绸，只收铁钱。”一下子就稳定了民心。从那以后，朝廷再推广“交子”就没有阻力了，因为百姓对主政者有了信任。

或许，宋仁宗这种含蓄渐进的方式，错过了大变革的可能时机，治不好国家的病根；又或许，这种方式的成功过分依赖他个人的宽仁和魅力，而令后世之君难以效仿。但无论如何，新党旧党的争议淡化了，日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，人才荟萃的一座高峰到来了——在“唐宋八大家”里，除了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，其他6人都活跃在仁宗时期，以至于林语堂说，这是中国文人“最好的时代”。

很多年以后，激进的王安石改革失败了，宋神宗又恢复了祖父仁宗的温和改良做法，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：“不许再去边界惹事，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。”辽国人或许不会懂得，他们敬畏的这个宋朝皇帝，为什么叫“仁宗”。仁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；在中国历史上，他是第一个被尊称为“仁宗”的皇帝，并造就了北宋一世的繁华。

（据《环球人物》）